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 五大理论问题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研究中心

红旗出版社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 五大理论问题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研究中心

朱有志 贺培育等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五大理论问题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研究中心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1

ISBN 7-5051-1168-X

I. 当……

II. 湖……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学习参考资料

②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 D26 ②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8596 号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五大理论问题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王农媛 封面设计：孙翠之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727 地址：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E-mail: hqcbs@publica.bj.cninfo.net

编辑部：64037149 发行部：64037154

印刷：廊坊市百花印刷有限公司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100 千字

ISBN 7-5051-1168-X

定价：10.00 元

序

社会主义的发展，从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的发表算起，迄今已有489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算起，迄今已有157年的历史；“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肇始，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算起，迄今也有88年的历史了。在这个不长不短的历史进程中，记录着太多的曲折、摸索与斗争。直到今天，历史的反复、意识形态的迷雾，仍然困扰着不少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诸如“马克思主义灵不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等问题仍不时回响在我们耳边。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有理由、有权利、有义务，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解答人们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迷惑与疑难。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在院长朱有志同志的亲自组织下，针对当前我国党员干部群众

序



经常遇到的最普遍但又是几个典型疑难问题，撰写了这本题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五大理论问题》一书，这是一个可喜的尝试。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有一个无敌的英雄叫安泰，他力大无穷，无人能够战胜。他的秘密在于，每当他与敌人决斗遇到困难时，往他的母亲——大地身上一靠，便获得新的力量。如果我们想让理论与安泰一样具有无穷的力量，理论也必须找到自己的“大地”。那么，这个“大地”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敢于面对重大理论问题开展研究。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要说服群众，就要彻底。也只有彻底，才有战斗力。而彻底的关键，就在于针对实际，直面矛盾，回应现实，这需要有理论勇气。书中论述的5个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灵不灵？”“‘三个代表’新不新？”“社会主义是不是？”“股份制度公不公？”“私营业主怕不怕？”都是十分重大但又不易回答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绕道走”，或光说“正确的空话”，或仅搞抽象的演绎，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只有勇于直面实际，敢于突破难点，才能发挥理论的威力。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们敢于选取这几个问题进行研究，本身就说明了理论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巨大的理论勇气。

第二，要乐于选取群众关心的事情开展研究。理

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无论理论研究还是理论宣传，都要始终自觉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时刻关注实践的要求，植根于生活的沃土，同人民群众和实际工作者紧密结合，坚持不懈地探索一条理论大众化的新途径、新形式，推动科学理论逐渐变为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是人民群众的需要，也是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本书里5个大问题中提出来的诸多小问题，不是作者们的臆造，恰恰是人们群众经常关注的难点、焦点问题，恰恰是许多党员干部需要向老百姓解疑释惑却又不易说清楚的问题。

第三，要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研究。把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说清楚，很难；把深刻的理论问题说得服人，更难；把深刻的理论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得生动，可谓难上加难。但理论要想让广大干部群众接受，就必须使高深的理论通俗化，具有可读性，才有渗透力。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要善于用通俗的语言解开群众思想上的困惑，用身边的事例说明深刻的道理，把逻辑的力量与事实的力量结合起来，把学术的严谨与表述的生动结合起来，用明白通畅的语言来摆事实、讲道理、谈问题、解困惑，做到观点鲜明而又有理有据，思想深刻而又通俗易懂，逻辑严谨

而又资料丰富。本书的写作，在这个方面不管做得如何，至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认为值得鼓励。

一个不厚的小本本，理论的是大问题，明辨的是大是非，体现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的是巨大的理论勇气。这是我阅读本书的整体印象，这是我乐意写序的缘故所在。

蒋建国

2005年1月5日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
五大理论问题

前言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党全国人民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齐心协力奔小康的热潮中，只要我们敢于正视现实，不回避问题，就不难发现：当前，党的各级干部经常碰到不少的理论诘难，其中，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五大难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灵不灵？

二是，“三个代表”：新不新？

三是，社会主义：是不是？

四是，股份制度：公不公？

五是，私营业主：怕不怕？

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态度是鲜明的，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当然灵，“三个代表”显然新，社会主义仍然是，股份制度可以公，私营业主不该怕。

但问题在于,虽然在理论界对这些问题有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论述和说明,然而,对于来自现实中的动摇者、怀疑者和反对者的种种“说法”,要做出有针对性的、深刻有力的然而又简明通俗的说服、教育和驳斥,从实际情况看来,却与党和党的事业发展的要求有着明显的差距。

正因为理论的说服、教育和驳斥工作有差距,就容易导致领导乏力,集体“失语”和众人茫然等现象。

对上述诘难要进行有力地回答和深入地批驳,就要求我们共产党的各级干部除了自觉增强理论意识,注重理论学习,加强理论研究,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之外,还必须敢于面对现实,决不回避难题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同时要善于从革命导师的“原著”中汲取理论滋养,说服动摇者、教育怀疑者、回驳反对者,同时,注意掌握说服教育的方法和艺术。

这样,就要求我们共产党的各级干部既要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又要善于从战术上处理问题,既要有政治经济的谋略又要有针对现实的胆略,既要注重马列的传承性又要富有理论的创造性,既要有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又要有思想教育的艺术性。只有这样,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在艰难的改革开放征程里,在曲折的市场经济道路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才会更加心安理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具有自觉性,更加富于创造性。

目 录

序	1
---------	---

前 言	1
-----------	---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灵不灵？	1
----------------------	---

一、国际共运遭受挫折，能说马克思主义失灵了吗	2
------------------------------	---

二、资本主义继续发展，能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	17
------------------------------	----

三、当今中国欣欣向荣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诠释	27
------------------------------	----

第二篇 “三个代表”：新不新？	39
-----------------------	----

一、“三个代表”不是简简单单的三句话	40
--------------------------	----

二、“三个代表”不是对老祖宗思想的重复	47
---------------------------	----

三、“三个代表”是我党新时期的指导思想	57
---------------------------	----

第三篇 社会主义：是不是？	66
一、相对的贫穷落后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吗	67
二、收入差距拉大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吗	74
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吗	80
四、腐败的存在与社会主义制度无关	88
第四篇 股份制度：公不公？	98
一、股份化等于私有化吗	99
二、公众化就是公有化吗	105
三、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110
第五篇 私营业主：怕不怕？	122
一、私营业主是不是新的剥削者	123
二、私营业主阶层会不会成为新的资产阶级	132
三、私营业主入党会改变党的性质吗	141
后 记	150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灵不灵？

不管人们怀着多么复杂的情感：是痛苦的失落，还是欣喜的回眸？是疑虑的增长，还是平静的怀旧？都不得不听任 20 世纪那不平凡的历史背影离我们渐渐远去。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20 世纪既是一个凯歌行进的世纪，也是一个遭受重大挫折的世纪。世纪前期，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工人运动热火朝天，包括苏联在内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分庭抗礼的两大阵营。但在世纪之末，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非但没有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断定的那样走向灭亡，反而呈现继续发展的态势。面对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面对社会主义遭受的严重挫折，一些人感到思想迷茫，以致信念动摇，“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的问题无可回避地提到了历史前台，对此，当代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作出自己有力的回答。

一、国际共运遭受挫折，能说马克思主义失灵了吗

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一是东欧剧变，一是苏联解体。

东欧的剧变始于80年代末的波兰。由于经济停滞，商品长期匮乏，供应紧张，导致当时的波兰陷于严重困境。在此背景下，团结工会首先发难，多次组织全国性的大罢工，逼迫执政的共产党妥协让步，同意举行议会大选。结果团结工会获得大胜，在其新组建的政府中，非共产党人取得了领导地位，共产党人成了少数派。波兰政局的动荡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紧随其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先后发生动乱，并最后都相继瓦解了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终止了其社会主义前行的步伐。

与此同时，苏联也发生了一系列惊人的变化：1988年苏共确定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施政纲领和目标；1991年发生了上层政变的“8·19”事件，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被囚；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签订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12月21日独联体成立，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

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马克思

主义也因此遭受诘难。

20世纪以来，有关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问题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苏东剧变后，这个问题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并且随着世界性右翼势力的一时得势，马克思主义还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诋毁与攻击。归纳起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观点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苏东剧变全部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例如，法国哲学家M.昂利在其《论马克思主义危机：死亡面面观》一文中认为，苏东剧变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引起的，其根源是马克思主义的污点；法国《宇宙》杂志主编J.埃伦斯坦也公开著文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后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今天在一切领域都证明业已破产，因此，现在是把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全部埋葬的时候了；英国右翼历史学家P.约翰逊也曾预言说：由于失去苏联国家的支持，马克思主义将在20年内消亡，等等。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今天已失去了效用，已不能指导今天的现实社会。例如，美国反共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苏东剧变后出版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和《大失控与大混乱》两部著作中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靠不住，马克思主义不能给一个政治上觉醒和活跃的世界提供框架。

马克思主义果然因此失灵了吗？当然不是！

苏联的解体，原因很多。最突出的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其具体表现是要



么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么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

马克思对于曲解他的学说或者对他的学说持迷信态度的人曾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则正面向人们告诫说：只有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人，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方法论就是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在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种理论观点，都是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引申出来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相反，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社会生产力始终居于最基础的地位。当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时，那时社会革命就要到来了。而革命的目的及革命后从事建设的目的，归根到底，也都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扫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

像这样既重要又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有时往往被扭曲甚至被否定。这种扭曲首先是由误解十月革命最初的使命所引起的。列宁在论述十月革命时曾说，有人指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这自然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证”，也就是说，列宁同样承认当时俄国生产力水平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但列宁同时指出，落后的俄国当时正处

于一种“特殊的形势”，即统治者卷入了帝国主义斗争并且一败涂地，全国生产停顿，社会混乱，统治者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而工农的力量则大大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工农群众起来夺取政权，然后利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创造出“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是完全有可能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1页）列宁所说的“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应当是指创造出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新的生产力水平，人民生活获得提高，并获得必要的文化水平及自由发展条件，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即使建立了工农政权，社会主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包括列宁在内的一些革命者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以为一旦政权在握，只凭单纯变革生产关系就可以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

于是，1918年下半年开始，列宁决定在全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管理，把大中小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对它们的生产和分配实行集中管理；对农民实行“余粮收集制”；对居民实行配给制，使整个经济关系实物化。实际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既取消了按劳分配，也取消了商品货币关系。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是被迫的，但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应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列宁想把它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有效



手段,以达到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目的。可事与愿违,“直接过渡”严重挫伤了工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剧了由于战争破坏而出现的经济困难。

面对现实,列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来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们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此后,列宁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纠正,是从“直接过渡”向“迂回过渡”的重大转折,是列宁对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新选择。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也使列宁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思考。他指出:“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他越来越相信,社会主义不能依靠革命所产生的群众的热情来建立,而只能在这种热情同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物质关心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而这种结合又只有通过扩大商品货币关系、贸易、合作制才有可能。实践表明,“新经济政策”和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大胆